

全体师生敬贺王永志院长90寿辰的对联中写到：擎起神舟向天穹，永志天和日月明。上联寓意王永志院长将一生奉献给我国航天事业，下联寓意王永志院长永远铭志航天造福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王永志院长曾讲到：“如果没有当年的‘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如果没有今天的载人航天，就会影响中国当前的科技水平和国际威望。”在他的领导下，航院能够为祖国的航天航空

事业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参与国家航天航空重大工程建设，我们为此感到光荣和自豪。

2010年5月4日，国际永久编号第46669号小行星被命名为“王永志星”。王永志院长是我们心中的明星，引导着中国载人航天向更遥远的星辰大海迈进，也指引着航院向建设国际一流的航空航天学科前行。

王永志院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继绝学 图日新

——忆清华老师刘桂生

○谢荫明（1976级基础课）



刘桂生教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桂生先生，因病于2024年6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刘桂生，1930年8月生于云南昆明。1949年初入岭南大学政治历史学系，师从陈寅恪教授学习中国史，次年9月转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52年毕业。1953年结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研究班。同年回清华大学任教，曾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社会科学

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兼任北京市第七、八届政协委员，文化部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等。1993年，调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1998年调回清华，同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自嘲与自信

1977年的春天，花季仿佛格外的长。清华大学的校园里，严冬过去，处处萌动着蓬勃的生机。

主楼一间宽大的教室里，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相继开讲之后，我们又开始了一门新的课程“中国近现代史”。

从右手侧门进来的，是一位微胖、中等身材的老师，他低着头，脑门很亮，头顶稍秃，脸上浮现着发自内心的、谦恭

□ 怀念师友

的、慈祥的笑。称得上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老师走到黑板前，写下“中国近现代史”后，又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刘桂生。刘老师端详着黑板上横竖笔划搭成的大字，自我调侃说：“清华大学马列教研室板书最差的两个人，第一是某某老师，第二是我。现在他调走了，我就是第一了。”刘老师的开场白引得我们会心地一笑。

但是，很快我们就知道，“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1931年语）所谓先生高下者，非仅看书法之谓也，有知识有水平之谓也。刘老师的知识储备、教学方法的确是一流的。

记得有一次，刘老师安排我们围坐在圆明园废墟旁，讲近代史课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刘老师双手比划着，告诉我们圆明园这座“万园之园”的规模、构成、建造过程、与凡尔赛宫等国外名苑的比较、英法联军为什么要执意焚烧……使我们增加了很多理论和感性的知识。特别是刘老师讲道：圆明园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宫廷花园、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艺术馆，是除紫禁城外的又一办公场所，是清朝皇帝营建最多、驻足最长的地方。为什么如此？刘老师娓娓道来：因为清朝和明朝不一样，明朝皇帝是汉人，如果一旦地方上起事造反，统治者可以关上城门，依仗御林军，凭借外城、内城、紫禁城一层的城墙进行抵御。在粮食、水源充足的情况下，坚持数月没有问题。与此同时，可以通知各地方官吏、军队前来营救。刘老师说这种营救不叫“救亡”，也不叫“救驾”，叫“勤王”。当围城的叛军一退，危险就可解除了。而清王朝建立在异

族统治之上，他们担心一旦有事被围在城里，各地的汉人可能不会勤王。所以他们便在北京郊区层层防御，在海淀一带另建宫廷、园林，部署八旗驻防营地，随时做好从圆明园策马开溜、重回关外的准备。

刘老师就是这样，在讲述课程的过程中，教了我们很多与历史相关的、又可能被舍弃的知识点，百问不怠，诲人不倦，要做到这个层次，非厚积不能薄发也。

还要说到的是，刘老师字劣之首的排名，很快就被打破了。因为他是我认识的老师中，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编辑、排版的，没有之一。后来他还告诉过我如何用激光笔扫描纸质文档，从而提高写作、编辑的效率，并且立刻演示给我看。可惜可叹，我似懂非懂，依然是一头雾水。而老师那年应该已是半百有余了吧！

日常知识告诉我们：水深不在于表面浪花和泡沫的多少，半桶水往往更加咄咄当。刘桂生老师满腹经纶，见多识广，博闻强记，因而自信满满，他不需要自吹自擂，不怕被别人的问题难倒，也不会神经质地保护自己的“自尊”和“自信”，能够轻松地自我解嘲，是因为他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

基础与升华

我们进校时，一个流行的口号是“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学生们如此，清华大学的老师们也是如此，他们在重拾外语，在辛勤备课，在撰写论文，在培育和收获科研的成果。当我们在图书馆抢座位、如饥似渴读书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刘老师在图书馆地下室的门口进进出出。经询问和打听才知道，刘老师当时正在编纂《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

料》，这套资料书共分三卷四册，史料珍贵，编排有序。看到很多地方介绍该书，都说是1980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但在我的印象中，至少这套书的前一、二卷，我在1978年前后就已经看到了。说到编辑史料，现在有的人可能认为是件很容易的事，找一些学生，从国内外的图书馆或大学资料库里，甚至从网上扒一扒，就可以凑出几十万字来。殊不知，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是一件很费气力、很见功夫的事情，要不是刘老师有深厚的外文和古文功底，这种事情是难以做成的，相关的研究至少要推迟十多年。

不记得是在清华大学还是我在别处听的一个讲座中，刘老师讲到赴法勤工俭学的由来，说到当时的发起人之一李石曾，他是这样介绍李的身世的：李石曾的爸爸号李石孙，那他的爷爷应该叫李石子，他的儿子、孙子按辈分可以叫玄孙、来孙……滴拉孙、奎拉孙等。虽然这个说法是玩笑，但我一下子就认识了那个在法国做豆腐赚了几个钱，从而支持孙中山革命、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奇人。

再次向刘老师请教留法勤工俭学这段历史是在三十多年以后。本世纪初，北

京市文物局、丰台区政府开始拨款修缮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旧址展览馆建在原京汉铁路火车房总管郭长泰的住宅里，这是一座有250多平米的法式小红楼。2012年前后，记得是一个寒冷的冬季或者是初春，有关方面要就留法勤工俭学文物保护和修缮召开一次学术论证会。我马上想到了刘桂生老师，介绍他是这段历史研究的专家权威，研讨会不能不请他。会议是在一排中学的教室里召开的，那天刘老师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会上做了重点发言。他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发生在中国近代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上的一个大事件，它曾是培育各个领域人才的摇篮。这一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先进科学技术的引入和发展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会后我们还一起参观了这座有着很陡木制楼梯的二层小楼。不久，2013年春，这处留法勤工俭学遗迹就和长辛店“二七大罢工”旧址等一起，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老师就是这样，能把看似最简单的东西、最基础的史料研究到极致，从而得出让前人、时人和后人都叹为观止的新论，刘老师对李大钊研究的贡献又是一例。1989年冬李大钊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成立。近三十年间，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主持的理事会上，我和刘桂生老师多有接触，我知道他主持和承担了《李大钊文集》《李大钊全集》《孙中山全集》注释这种艰涩、浩繁的工作，并且撰写了《“宗彝”故训与“民彝”新解——李大钊民彝思想试析》《李大钊政治思想的儒学底蕴——民本、德治、反专制》这样高水平的论文，他的



刘桂生先生（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先生交流

□ 怀念师友

文章角度新颖、立论确凿，论文一公布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李大钊研究专家张静如老师在很多场合都表示由衷的佩服。刘老师曾说李大钊是受系统的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批人，又是中国接受西方新式教育最早的一批人，所以他能够吸收各方的精华，能够比较鉴别，从而能够找到一条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并坚持始终。

刘老师师从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先生，又在法国、德国、美国、俄国、荷兰等地的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他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国革命史研究方面走出了一条面向世界的新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的所作所为又何尝不是循着李大钊等先贤的方向、方法在前行呢？前年，同是我们老师的钱逊先生逝世，细细体会，在刘老师、钱老师身上有许多的共同点。窃以为，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研懂了历史，看清了社会发展的真谛，他们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国家和民族的脊梁。

短暂与永恒

从1977年起，除了在清华大学两年多的时间里耳提面授外，毕业后我与刘桂生老师的见面大多是在一些学术活动和会议的场合。老师不是一个高调的活动家，回想这些年我们参加的校庆返校活动，遗憾的是竟没有一次见到过刘老师，以致写作此文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共同留影。

我的记忆里，都是一些短暂的片段。

2001年秋天，香港史学界在中文大学举办辛亥革命90年学术研讨会，我凭着《革命与建设：孙中山的抉择》一文参

会。三四天的时间里，有幸和刘老师及他的学生一起进进出出，学术、生活，海阔天空。刘老师谈起我们住地油麻地的过去、弥敦道地名的由来、香港的语言和习俗，娓娓道来。他是我们的导师，也是我们的导游。以致于我以为刘老师小的时候，曾有一段不短的时间是在香港度过的。当时我还自忖，难怪老师的外语这么好。学术会议后，刘老师没有和我们一起回来，似乎他还另外应邀去作学术报告。离开香港过关时，因为我携带了不少会议材料，还被要求开箱检查，所以印象很深。

本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北京党史工作系统的同事们要求出国参加考察培训、业务研讨的愿望很强烈，在遵守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我们积极地想办法。记得我曾经在电话里向刘老师求援，过了一段时间，刘老师请我到他在清华大学南门不远的家里去。看得出来，刘老师为了我们的请求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以法国大学等研究部门为邀请方，从出国学习研究的目的、要求、北京与国外研究部门可能感兴趣的课题，到国外邀请、国内组团的具体程序都为我们做了详细的考虑和规划。那天我们讨论了很久，向老师讨教了很多问题，中午刘老师留我在他家吃了饭，还喝了一些酒。虽然后来因为名额限制，事情没有办成，但我们依然为老师的热忱和对地方党史工作的爱护深深感动。

刘老师诲人不倦，我第一次在他的文章中看到了历史研究中的“语境”问题；他当面和我说起孔子学说在中国文化中的积极意义；对于学生的发展，“近亲繁殖”的议论，他少有地气愤动容……刘老

师很早就签名送给我一本他编著的《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想》，可惜我断断续续，至今没有读完。此时此刻，面对师长，怎是一个“惭愧”了得！

为了纪念北京建都860年，2012年前后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组织一批画家，重点创作了北京几次立都的巨幅画作。受文史研究馆负责人的邀请，我参加了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期的论证会，与画家赵建成一起探讨了如何表现新中国建立新貌和领袖们的风采。2017年8月，该画展以《北京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展》的名义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开幕式上我欣喜地看到刘老师，他是北京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当然位于被邀请之列。只是在年轻学生搀扶下的刘老师，看上去已经老了许多，我上前向他问候，寒暄片刻之后，我们就分别循着画作次序，一幅幅地在各自感兴趣的作品前观赏、停留。画作很多，一、二、三层展厅都有，参观过程中我们还几次有所交集。我边看边想：刘老师80多岁了，还对参观美展这类的活动保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可能这就是他知识渊博、兴趣广泛、日积月累的缘故吧！本打算看完所有展品之后再和老师细聊，送他上车回家，不想观展的人流过多，最后却遍寻不得了。

更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看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联合发布的讣告，心头一紧，看看其中的表述，很多高度是我辈不晓、更是不及的。在我记忆中的刘老师，留下的都是短暂的瞬间、忙碌的身影，但这又何尝不是他的高尚和永恒呢！

● 悼念简讯

席葆树学长（1959届动力机械），因病于2024年6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席葆树，1935年8月15日出生于河南省济源县。1958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1962年8月苏联哈尔科夫航空学院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归国，担任工程力学系流体力学教研组实验室主任。1985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席葆树是我国生物流体力学创始人之一，他带领团队成功完成测试人工心脏瓣膜的第一代实验装置和实验系统。还曾领队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压力波测量，研制了对台湾广播用气动高音喇叭并实际布设应用，在人工影响天气的科学研究中开创运用低频声波实施人工增雨、人工消雾的创新探索。

叶明学长（1968届工物），因病于2024年7月6日在杭州逝世，享年82岁。叶明，1942年12月27日出生，江苏泰兴人，1968年3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8年12月离开清华，1968年底至1979年11月在陕西省铜川市电机厂任技术员，1979年11月至1997年2月，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室主任、校机电总厂厂长、副校长。1997年2月至1999年2月，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作，任教授，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副院长。1999年3月至2003年6月，任杭州电子工业学院院长。2002年至2014年任杭州清华大学校友会副会长。